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 著

刘 青 牛 可 译 牛 可 校

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Nations — Is There Still a Third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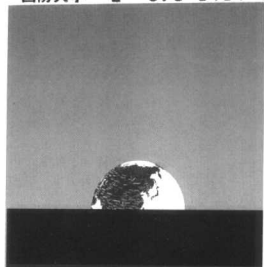
Howard J. Wiard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防大学 2 098 3131 5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 宁 骚 主编

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

〔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 著

刘 青 牛 可 译 牛 可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Howard J. Wiarda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Nations: Is There Still a Third World?

EISBN: 0-15-505104-0

Copyright ©2004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omson Learning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sia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by Thomson Learning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s and Taiwan).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销售。未经授权的本书出口将被视为违反版权法的行为。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981-265-453-4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5-314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美)威亚尔达著;刘青,牛可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ISBN 7-301-08616-4

I. 新… II. ①威…②刘…③牛… III. 第三世界政治学 研究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5026号

书 名: 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

著作责任者: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 著 刘青 牛可 译 牛可 校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616-4/D·10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730mm×980mm 16开本 14.25印张 226千字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译丛总序

宁 骚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当这种方法被系统地用来认识政治现象时,就形成了政治的比较研究;当比较的对象是各自独立的政治体系时,这种政治的比较研究就成为比较政治学。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政治学,而他获取和分析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就是比较,这样他就同时创建了比较政治学。自19世纪中期起,经验研究和比较分析推动着政治学从思辨的哲学变成实证的科学。到19世纪末,政治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比较政治学则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比较政治学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比较方法必须贯穿该学科领域的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中。这一方法要求在同一研究中观察和分析的对象须是不少于两个并互为参照系的个体或群体,比较的直接目的是辨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比较始于对事物外部特征的描述,进而对其异同做出分析和解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是要使比较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比较分析必须选择和使用一定的理论工具。因此,比较的方法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纳其他理论方法和技术方法的一种方法。第二,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至少应当是独立的政治体系,所以现时代的比较政治学可以简括地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研究才属于比较政治学,明确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除此之外就难以划定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但是,以民族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把国家和政府作为直接观察的对象。事实上,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国家的总体框架与情境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单位,无论群体、组织还是个人,尽收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第三,比较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经验出

发,进行实证研究或经验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和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或另一核心要素。对比较政治学来说,真理是具体的。一切既有的概念、命题、模型和理论的真理性,都有待于经验和事实的进一步验证,都以各个事物发生与沿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换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有一条主线,这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才能更有效地使政治的跨国比较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比较政治学的这种科学诉求或科学化努力,迄今已经经历一系列重大的范式变迁。在19世纪,历史主义是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这一名言成了比较政治学者的共同信条。人们把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比较”的方法。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制度主义成为这门学科的主流范式。人们相信,在宪政民主制已经巩固的条件下,由现行法律体系确立的一系列正式制度规范,制约和决定着各种政治主体的实践活动;而现行法律体系是人们在关于国家与法的政治理念指导下构建起来的。政治哲学—法律体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跨国分析的典范思路。因此,这种制度研究法又被叫做法律—制度主义。同时,这一主流范式并不排斥或贬抑历史主义;相反,在获取和处理实证材料的基本方式上,以及在对制度变迁和制度规范作用于政治实践的过程与结果的研究上,它必须借助于历史主义。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取代法律—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行为主义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引进的一种方法论,它与刚刚兴起的电子计算机和社会统计学的应用相结合,使比较政治学在获取和处理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革,不仅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门学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全球的范围,而且使这门学科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此,比较政治学不再仅仅是静态、描述的,而是动态、解释性和预测性的,理论的建构与验证成为研究的动力和目标。60年代末,比较政治学开始转入后行为主义时期。后行为主义不是一种研究范式,而是多种范式的并立和竞争,影响较大的先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范式,接着是组合主义或法团主义范式,现在是新制度主义范式。

新制度主义被区分为三种既有联系而又有显著区别的分析路径:理性选

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个演绎的逻辑体系,社会学制度主义不能清晰地区分文化与制度,因此只有历史制度主义对比较政治学这门经验科学来说,才具有广阔的适用前景。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关系。它把制度看作是一定的历史情境的产物,而制度塑造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并且影响着行为者的整个行动过程及其对工具性行为的选择。它认为个体是深深地嵌入制度网络之中的,个体偏离制度会使其境况变得更坏;制度对于解决集体行为困境的贡献越大,它就会越有活力。它将焦点集中在展示一定的政治现实中多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作用,通过将结构化要素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揭示制度是如何构建这些互动关系并藉以影响政治结果的。历史制度主义提供的新视角,可使比较政治学更加有效地去解释当今世界各国内部政策的延续性和不同国家间政策的变异性。

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关系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解释的困境,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指明了走出困境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历史研究法是一切实证科学的唯一方法,这种观察方法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现实生活发展过程中的人。他们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对一定的人进行的经验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同时明确地认识到影响这个过程的还有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也认识到各个人都有其自己的、方向各异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并对外部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就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导致了一定的历史情境的形成。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揭示出了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的更深层次的动因,从而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更有解释力的一种方法论。

比较政治学的每一种主流范式都有众多的学者遵循,并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归类,我们可以把比较政治学划分成这样几种基本的研究领域:(一)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辨识不同

民族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异同并解释导致异同的原因,用统一的概念体系来认识和表述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进而抽象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在经验层面可证伪,从而确定其解释力的强弱和范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积累是极其丰富的。自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起直到现在,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多出现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对比较政治学来说,任何既有的理论的真理性都有待于新的事实和经验的检验,因此被积累起来的理论成为新的研究项目的理论假设的来源和分析框架,从而具有方法的功能。由此可见,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统一的。(二)比较政治制度。在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以前,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政府或比较政治制度。自比较政治学诞生以来,政治体制始终是这门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政治体制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统治者和管理者的行为准则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构成的整体。政治制度凝聚了所有种类的权力,约束着体制内外各种人的行为。观察和比较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制度,是认识和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最方便视角。因此,尽管曾受到行为主义范式的有力冲击,比较政治制度仍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领域被保留了下来。(三)比较政治行为。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可区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两类。比较政治制度只观察和比较制度性行为,非制度性行为不在其视野之内;而比较政治行为则对二者都进行研究,并注重观察和比较非制度行为——既包括体制内各种政治角色的非制度行为,如腐败、贿选、幕后交易、营造和维护非制度性社会关系网络等等,也包括体制外各种政治角色,如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大众传媒、辅助决策机构(智囊团)、企业界和学术界精英以及宗教、族群、社会阶级与阶层等等的政治行为。对比较政治学来说,比较政治行为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研究视野,增强了它的理论构建能力,推动着它生发出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民族政治学等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从而使之真正地担负起了政治学科学化的重任。(四)国别政治与地区政治。比较政治分析是建立在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系统的、深入的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分析就失去了实证的基础。

比较政治学到现在已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这门学科的所有主流范式都得到了引进并被应用于研究工作中,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我国的比较政治学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法律—制度主义从这门学科被引进时开始，长期处于主流范式的地位，至今仍在政府颁布的高等院校专业分类目录中有显著的体现。第二，没有经历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的阶段，科学化不曾成为这门学科的强烈诉求：获取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始终是汇集既有文献记录而不是社会调查，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极其罕见。第三，在从事比较政治分析的学者中，很少有人做过或同时在做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的研究；而在从事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研究的学者中，也很少有人真正地关注比较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尚未能够正确地处理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向世界，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观照自己的国家，比较政治学将适应这一需要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为推动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有选择地评介国外的学术成果是十分必要而且必需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体察到这一情势，筹划、组译并将出版《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这套丛书收入的著作侧重于可以辅助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甚至直接可用作教材的作品，具有入门导引性质，但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能够相当系统、全面地勾勒和凸显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对象、议题和方法，介绍和反映在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构建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我相信，这套丛书会使有志于学习和研究比较政治学的读者受益良多。

2004年4月12日

作者简介

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J. Wiarda),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政治学教授、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高级访问学者、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助理。曾就读于密歇根大学、佛罗里达大学、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除专长于拉美和南欧的政治和发展以外,威亚尔达还对亚洲、东欧和俄罗斯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是四任总统的顾问,并为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及私人组织出谋划策。著有《全球化时代的欧洲政治》、《比较政治学导论》、《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美国的对外政策》、《民主及其不满》、《拉美的政治和发展》等著作。

序 言

如果你以前从没有到过第三世界，你就有可能为眼前的所见所震惊：贫穷，悲惨，疾病，肮脏，污秽，无效率，噪音，臭味，严重的污染，混乱，镇压和经常违反人权，较低的识字率和低下的卫生保健水平，大量的残疾成年人（通常是因为孩童时的疾病和外伤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营养不良、胀大肚子的孩子（不是因为吃得太多，而是因为吃得太少）。无处不在的贫穷和落后是如此的严重，甚至让人感到无可救药。然而同时，这些国家里的富人却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他们看起来对穷人的困境既无关爱之心，也无怜悯之情。在这些贫困国家里的所见所闻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以至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访问者——他们所在的社会要富裕、民主而且平等得多——初来乍到之时都不免要经历“和平队”所说的“文化冲击”：对所看到的感到反感，不相信人们真的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下生活，并强烈地想回到自己的家，那里的一切在对比之下都是舒适和亲切的。然而，在文化冲击逐渐减弱之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却都想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们。第一步就是要通过阅读来了解发展中国家，从而找出帮助他们的办法。

“发展中国家”或是“第三世界”这个概念——也是现实——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为人们所感知，已经有 40 年之久了。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一大批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前殖民地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了新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古巴革命刚爆发不久，华盛顿就担心整个拉美都会爆发卡斯特罗式的革命；在美国，随着约翰·肯尼迪（Jonh F. Kennedy）的就职演说以及“和平队”和争取进步联盟的发起，对发展中国家所抱有的理想主义热情高涨。看起来好像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新兴国家（我们曾经用“落后”“原始”、或“不文明”来称呼它们）不仅将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也会受到极大的关注。

vii

到此时为止,政治学中的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几乎只关注“发达的”、工业化的和“进步的”西欧和北美国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的主要对象先是西欧,然后是日本和亚太,最后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西方几乎没有人对非西方世界投入太多的关注;北半球是权力、财富和世界重大事件的焦点,而南半球则完全被忽略了。南方地区或第三世界仍然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即使有的国家取得了独立,这些南半球的国家也被认为是过于贫穷,过于欠发达,过于弱小,或者过于不稳定而不能在国际大家庭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十年前,这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大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且大约半个世纪以前,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就已经开始着手应付这些新出现的国家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欠发达的恶性循环,以及因此而面临的困境,同时他们也开始思索如此众多而又常常是不稳定的新兴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将意味着什么。是时候进行评估和总结了。这些新兴的或者说发展中的国家如今确实获得发展了吗?为什么东亚走在了前头而其他发展中地区(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大部分都落在了后头?是否存在一个成功发展的公式?这些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既然苏联(“第二世界”)已经解体了,再谈论“第三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吗?尤其是在这个范畴内,既包括有大国(中国)又有小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既有相对富裕的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又有非常贫困的国家(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眼下我们最需要的是对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发展、现时的状况和今后的何去何从进行新的评估。

因此,是写本关于新兴国家政治发展的新书的时候了。尽管全美国的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各院系中都开设有关于发展的课程,相关的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时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却没有什么书可以被用来当作教科书。同时,第三世界已经发生了划时代和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在现有的著作中还没有得到反映。

这些重要的变化主要有:苏联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的崩溃,威权主义在很多国家的衰落以及民主在全球范围表面上的成功,所有国家都需要以某种方式对新自由主义的调适,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快速发展(其中许多国家已经告别了第三世界),中国、巴西和印度享有的日益上升的重要地区和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艾滋病和它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文化、社会、行为、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全球化。这些巨大的变化

已经撼动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三世界,但我们却缺少一部清晰、全面和最新的书来评估和透视这些变化。

这本书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它组织严密,文笔流畅。本书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写,很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教科书。但是笔者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背景,所以,这本书对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中关于发展的课程同样有用。

本书语言简洁而可读性强,但是它涵盖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对于很多课程都适用。它避免了专业性强的术语,而以清晰易懂的方式来叙述政治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本书可以用在“比较政治学导论”这样的课程中,也可以用在深入研究发展中地区或第三世界的课程中,还可以用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生讨论课中。它能够被发展、第三世界和非西方地区研究领域的多学科课程所采用。本书是以专题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无意于提供具体细节,也无意于对各个国家进行详细叙述,所以它更像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一本入门书。并且它总结了四十年来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基于这些原因,它可以被用作发展经济学、发展人类学、发展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教科书。

本书涵盖了如下重要的课题和当前的热点问题:我们是如何开始又是为什么对第三世界产生兴趣的;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发展研究领域的贡献;这一领域的主要著作和对它的批评;发展主义幻像的破灭和其他解释范式——比如依附理论、官僚威权主义、有机国家主义(organic-statism)和统合主义(corporatism)——的兴起。这些介绍背景的章节之后是有关亚洲成功的例子(新兴工业化国家,或称 NICs)及其启示;发展中地区民主化的“第三波”;新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和“历史终结”论;全球化及其在文化、社会、经济、技术、行为和政治等方面的影响。结论部分则将这些不同的主题汇总到了一起,并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顺利抵达了 21 世纪的现代世界,而有些国家则步履蹒跚,还要说明哪些战略促进了发展,而哪些没有。

笔者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发展中国家度过的。从 1960 年到今天,正是许多新兴国家的成长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作者曾在拉美、非洲、中东、亚洲、俄国和东欧居住、旅行和从事研究。不在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一直在为华盛顿的各种智库工作,希望美国增强对第三世界的注意和改进对第三世界的政策。ix
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是笔者一生所系;而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四十多年来所

有努力的目标不仅在于研究发展问题,还在于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获得发展。这本书总结了我通过毕生努力所体会到的一些认识。

我要感谢在这段时间对我的研究提供资助的这些美国机构:马萨诸塞大学政治学系、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EI)、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后面三个都在华盛顿。在第三世界,在拉美、非洲、亚洲、俄国、中东和东欧、中欧,我也有过许多冒险的经历,帮助过我、有恩于我的人有很多,我无法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列举在这里;这本书部分上也是对他们的慷慨热情的一个回馈。像往常一样,爱德·西凯拉·威亚尔达(Iêda Siqueira Wiarda)博士在各个方面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理解;多萝西·霍顿(Doris Holden)夫人也一如既往地担任了本书的编辑和文字处理工作,她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芭芭拉·西斯路克(Barbara Ciesluk)为本书的版面设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所有这些人和机构对本书的最后出版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文责还是由作者自负。

x

霍华德·威亚尔达
乔治亚州阿森斯
2003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发展中国家的世界	(1)
欠发达的地理和区域基础	(18)
不易治理性、失败的国家 and 对外政策	(24)
发展的第一、第二、第三和其他世界	(26)
第二章 发展概念的起源及相关的重要问题	(29)
聚焦发展中国家	(30)
早期的发展研究著作	(34)
发展研究著作的大量涌现	(44)
第三章 发展的幻灭：军事政变和官僚威权主义的兴起	(50)
对发展主义研究方法的批评	(51)
发展主义以外的其他方法	(55)
对发展主义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57)
现实世界中的官僚威权主义	(57)
发展的威权主义式道路	(61)
威权主义和统合主义	(67)
友好的专制暴君和美国的困境	(70)
第四章 发展的成功范例：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兴起	(73)
大老虎和四小虎：探寻亚洲成功案例的原因	(74)
结论	(90)
第五章 发展中世界向民主的过渡	(95)
威权主义体制面临的危机	(97)

民主的定义	(100)
案例和类型	(102)
向民主过渡的原因	(105)
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存在的问题	(110)
第三波的结束?	(125)
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及其问题	(126)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	(127)
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	(132)
“华盛顿共识”中存在的错误假设	(138)
经济危机	(142)
社会和政治后果	(145)
第七章 全球化以及对它的批判	(149)
当前背景下的全球化	(150)
全球化的制度机构	(158)
全球化的成功和失败	(166)
反全球化分子	(171)
结论	(174)
第八章 结论：发展中地区的未来	(176)
有关发展的诸理论	(177)
推动发展的要素	(180)
建议阅读材料	(187)
索引	(193)

第一章

引论：发展中国家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发展中国家是什么样的，而无需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就像在序言中所描述的，凭着声音、气味和景象我们常常就能判定我们是身处在发展中国家。我们所看到的满眼的极度贫困和混乱，很可能就是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持久的印象。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我们也习惯于看到个别的贫困现象，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但绝不是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所看到的这种极度的贫困。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贫困是全社会性的，完全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感染到全民族的贫困文化。这种穷困、吵闹、陌生和混乱（或者至少看起来是混乱，通常混乱中也存在一种秩序和体系，虽然这已经不是我们理念中的那种秩序和体系）交集在一起的景象简直让我们难以忍受。有些人就因为一直没能适应这种差异，最后沮丧地回到家乡，还有的人则在一段时间后开始意识到，虽然发展中国家与我们自己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但通常它们也有一种动力和活力，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一种美，甚至它们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包括政治上的——这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和了解。

虽然如上的这些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发展中国

家,另外我们还有更精确的方法对欠发达进行评估衡量。20世纪60年代初我最初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欠发达的标准通常是每年的人均收入在300美元以下。人均收入是将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NP)除以该国人口总数得到的每人每年的收入数或平均收入数。每人每年所得在300美元以下就被划为贫穷的或欠发达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早期,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年人均收入都在这个数字以下。非洲甚至更低,大部分国家还不到人均100美元。部分亚洲和中东的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还能经常听到说,发展中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每天依靠不到1美元的生活费用勉强度日。

这些早期阶段之后,数字有了些变化,一方面是因为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国家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比如,世界银行就依据人均收入将国家划分为四类:

1. 低收入国家(low-income countries—LIC)——人均收入为755美元或以下。
2. 中低收入国家(lower-middle-income countries—LMC)——人均收入在755美元到2995美元之间。
3. 中高收入国家(upper-middle-income countries—UMC)——人均收入在2996美元到9265美元之间。
4. 高收入国家(high-income countries—HIC)——人均收入为9266美元或更高。

当然,这种分类多少有些武断:一个国家不会一夜醒来突然发现自己从低收入国变成了中低收入国,并为此举国庆祝——尽管这一步可能的确发生了,并且当然是很值得庆祝的。通俗地讲,我们这些从事发展研究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喜欢说,当一个国家迈过了年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门槛后,它就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摆脱了欠发达的恶性循环,转向一种更大的发展或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另一个门槛则出现在一个国家的年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到那个阶段,外援往往就要被切断了,因为我们认为那时这个国家就已经“毕业”,并进入到自我持续的增长阶段,因而不再需要外援为其注